

调适、规划与重建： 抗战时期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张龙平

内容提要 作为基督教教育的全国性协调组织,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由来已久。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创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使其与其他文教机构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迁移过程。在此期间,教育会利用其沟通中西,沟通教俗的特殊性,组织人力与财力,从事中学救助、大学规划、宗教建设等活动来展现自己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领导者应尽的义务。战后教育会完成回迁与重建,踌躇满志以图东山再起,但无奈时过境迁,教育会步履维艰。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基督教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重建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①的前身要追溯至 1877 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为解决教会学校学生的教科书问题,与会人士决定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② 时至 1890 年,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面临日益繁重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时,这个出版机构显得无能为力,于是一个崭新的组织——中国教育会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成立,其宗旨为“提高对中国教育之兴趣、促进教学人员之友好合作”^③,而原有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也由其继承。^④ 进入 20 世纪,随着中国人自己的新式教育事业发展,教会教育先驱者的地位不再,中国教育会组织也由规划整个中国教育事业向协调基

① 有关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研究,前人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如: Wang Shu-huai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890-1912: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in the missionary education in China* Honolulu 1963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及其出版事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1971年。王立新:《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孙邦华:《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与西学东渐》,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第1期,2004年6月。陈国栋:《教会教育与国家发展——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之个案研究(1920—1940)》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然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晚清时期,对民国之后的历史探讨不多,除了陈国栋之外,对抗战时期教育会的历史基本没有涉及。因此,就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而言,抗战时期及抗战以后的历史是比较模糊的,甚至于有些学者认为抗战时期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终止这样错误的认识,如陈国栋在其文章中提出:“基督教教育会确实停止运作时间,从现有史料无法确切得知,但从战争发展可知,基督教事业到 1942 年,日本与美国宣战后也无法以租借地的保护继续维持,教育会的组织当在此时被迫解散。此后中国本土即不再有一个以基督教教育为宗旨的教育社团存在。”(参阅其文第 151—152 页)而实际上,抗战时期教育会不仅没有停止活动,而且在战时救济与战后规划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的组织与活动一直存在至 1951 年。

② “The Shanghai Missionary Confer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VIII May-June 1877, p. 247 该会自 1879 年始采用中文名“益智书会”,见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 November-December 1879, p. 470

③ J. Fryer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XIII No. 1, 1892, p. 31

④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 xlvi 该会中文名继续沿用“益智书会”。

督教教育的方向回归, 因之中国教育会的名称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① 1922年巴顿调查团来华对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来说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它不仅指明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今后“更中国化、更有效率、更基督化”的发展方向, 而且细致的规划了教育会组织的中央与地方发展战略。^② 此后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全面发展时期, 它在中央建立了总会及下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育委员会、宗教教育委员会、推广与成人教育委员会等 4 个职能委员会, 在地方建立和完善了多达 11 个省级或跨省级的分会, 一个覆盖全国的教育会网络全面铺开。^③ 但好景不长, 1927年后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民族主义情绪被再次点燃, 在华基督教事业遭受重创, 基督教教育事业也由此逐渐进入国家教育系统之中,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所能发挥的空间日益萎缩, 各地方教育会除了华东、福建之外, 大多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为应对新情况, 解决教育会自身的难题,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于 1934 年进行了改组, 改组的方向有两条: 一是密切教育会与教会的合作, 二是重建地方教育会。^④ 改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35 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合作, 教育会充当其下属的基督教教育委员会; 1934—1936 年华北 (1934)、广东 (1935)、华中 (1936) 三个地方分会相继恢复, 四川分会也在积极筹备。^⑤ 1936 年, 为了与政府主导的教育会相区别,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Union)。^⑥ 正当教育会准备重整旗鼓之时, 突如其来的抗日战争重创了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 使得教育会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

一 战时迁移

1937 年 7 月,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为躲避战火的纷扰, 树立对国家忠诚的形象, 不少的教会学校都选择了迁移。以 1938—1939 年度的基督教中学为例, 在当年统计在册的 196 所基督教中学中, 有 96 所经历过迁移, 其中 33 所迁入上海租界、16 所迁往四川、12 所迁往香港、3 所迁往澳门、4 所迁往云南, 另有 28 所在省内迁移。^⑦ 迁移的主要方向有两个: 一是后方; 二是外国保护区。在上述的 96 所迁移中学当中, 迁往外国保护区的 48 所, 迁往后方的 48 所。中学如此, 大学也一样, 至 1939 年, 13 所新教大学中有 11 所经历了迁移, 其中迁往上海、香港两地的外国保护区 5 所, 迁往后方的 6 所。^⑧ 于是战时的上海和华西成为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中心, 以上海为例, 1939 年上海集中了 4 所基督教大学, 学生 3333 人, 占全国基督教大学学生总数的 54%; 40 所基督教中学, 学生 7231 人, 占全国基督教中学学生总数的 15%。^⑨ 可见, 基督教学校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在选择办学地点

①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VIII No 1, January, 1916 p 1.

②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Made by An Educational Commission Representing the Mission Boards and Societies Conducting Work in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1922.

③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2. Chart 1—2 这 11 个省级地方分会是: 福建 (1905)、华西 (1906)、广东 (1909)、华中 (1911)、华东 (1914)、华南 (1915)、满洲 (1916)、山东—河南 (1917)、湖南 (1917)、直隶—山西 (1917)、河南 (1920)。

④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改组会议纪录》,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卷第一期, 1934 年 3 月, 第 66 页。

⑤ Ching-Jun Lin, “Christian Educational in China”,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6—37, p. 219.

⑥ 秋笙: 《本会更名“教育协会”》,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二卷第一期, 1936 年 3 月。

⑦ Kiang Wen-han, “The Educational Trek”,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39, p. 196.

⑧ 《全国基督教大中学迁移近况》,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 1940 年 3 月, 第 90 页。这 13 所新教大学中, 只有燕京和华西暂未迁移, 沪江、东吴、圣约翰、之江迁往上海租界, 岭南迁往香港, 福建、华南迁往福建内陆, 金陵、金女大、齐鲁迁往华西, 华中迁往云南。

⑨ 杨永清: 《战后中国学校教育之动态》,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 1940 年 3 月, 第 14 页。

和迁移方向上比国立学校占有优势,战时的上海租界成为基督教学校,乃至教会机构的云集之地。

抗战开始后,上海地区教会机关急忙将办公场所迁往公共租界,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所在地——上海市圆明园路169号,就在靠近外滩的公共租界之内,教育会也因此逃过一劫,他们还如往常一样表面上平静地在租界内办公,尽管此时的租界已经越来越多的充满着彷徨,甚至是绝望的气氛。此时的教育会刚经历过改组与调整,在组织上正积极筹建地方教育会,在工作上正密切与协进会、广学会、宗教教育促进会等教会机关合作推进学校宗教教育工作。^①

教育会仍实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地方分会”三级管理体制,但加大了差会(即基督教差派传教士到国外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教会机关人员参与的比重。抗战爆发时,董事会曾一度保持活动,以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为主席,钟荣光、司徒雷登为副主席,黄溥为干事,富勒(G. V. Fuller)为司库。执行委员会是教育会的常设机构,由来自各基督教学大学和教会机关的11名成员组成,设总干事一名,并下设3个附属委员会,分别是高等教育委员会,以葛德基(E. H. Gressy)任总干事;中等教育委员会,以何荫棠任总干事、葛德基任副总干事;宗教教育委员会,以缪秋笙任总干事、卢琳(Mabel R. Nowlin)为副总干事。^②这3个附属委员会在战时,特别是“珍珠港事件”之前一直保持活动,除中等教育委员会干事何荫棠因战争阻隔难以到上海赴任,1938年秋教育会另选原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干事赵传家接任之外^③,这3个委员会的干事在战时都没有改变。1939年,为促进战时基督教学校宗教教育工作的开展,促进教会学校校友参与教会事务,执行委员会又新设了两个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即“中学宗教工作委员会”和“教会与校友关系促进委员会”,分别聘请马鸿纲和吴高梓为干事。^④这样,执行委员会的规模和业务开展在战时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此外,执行委员会还设有3名海外联络干事,分别是贾腓力(Frank D. Gamewell)、罗炳生(E. C. Lorenstine)和吴哲夫(E. W. Wallace),协助教育会在英美拓展业务。^⑤

此时的地方教育会已有5个,华西正在教育会和四川基督教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之下准备恢复。1938年7月,四川基督教中等学校教育研究会在成都开会,除了讨论学校行政、教学、宗教教育等问题之外,与会代表认为在战时中国教育中心西移,各基督教学校宗教教育工作组织涣散的状况下,重新组织四川基督教教育会,以联络四川(包括西康)的基督教学校,共谋教育事业发展与改进尤为必要。^⑥于是,会议推举张凌高、袁柏樵、杨重熙等1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聘请鲍文年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四川基督教教育会恢复之后,积极开展活动,服务于教会学校、教会及地方,成为教育会及外界了解四川基督教教育事务的窗口。以1939年度为例,四川基督教教育会的工作就包括了拜访各地学校及教会、协助各校推进宗教教育、促进全川学校彼此联络、搜集介绍各种书报及其他有关资料、举行年会及其他会议讨论各种教育问题、随时协助各校应付非常局面、征求个人会员、推行本会文字事业、刊印《华西教育》月刊和《儿童》半月刊、协助四川基督教协进会主办的基督教精神总动员运动、调查康、陕、滇、黔四省的基督教教育状况等十余项内容。^⑦

除了四川之外,其他的几个分会在抗战初期也保持活跃,特别是华东、福建和广东。华东教育

① Ching-Jun Lin, "Christian Educational in China",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6-37, p. 219

② "Directory of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IX, No. 4, November 1937, p. 268

③ C. C. Dja, "Program of Work for Council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f the C. C. E. 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X, No. 10, October 1939, p. 559.

④ Chester S. Miao,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39, p. 219

⑤ "Directory of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IX, No. 4, November 1937, p. 268

⑥ Lettie A. Archer, "Reorganization of Szechuan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X, No. 4, November 1938, p. 153

⑦ 鲍文年:《四川基督教教育协会工作报告》,《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四期,1939年12月,第84-85页。

会在其干事赵传家的领导之下，于华东沦陷区开展征求会员、通传各校消息，刊印《华东教育》月刊、举办教师进修会、协助各校举办合作事业、组织小学教师研究会、协助救济工作、联络其他团体、办理团体及个人委托事项等工作。^① 福建教育会则在邱道根的带领之下，积极从事协助各校宗教活动、协助各校增进效率、协助各校解决难题、举办会议、访问学校、刊印《教育讯息》协助各校指导毕业生升学就业、搜集介绍各校优良行政及教学方法、办理学生救济、协助闽北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事务、联络上海总会及各地分会、编制各种图表报告、办理日常及各校委托事项。^② 广东教育会则主要从事推动征求荣誉军人服务人员工作、推动节约建国储蓄金运动学校组工作、举行联校礼拜、教师进修班、示范教学、举办宗教教育同工座谈会、行政分组讨论会、中小学校长座谈会、训导工作人员座谈会、有系统的宗教演讲、设立宗教图书室、组织各科教学问题研究会、介绍教学名著、各校教职员人数调查、各校宗教课程课本及宗教教育实施计划调查、协助学生救济委员会、协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香港办事处办理一切事工。^③ 可见，在抗战初期，尽管各地遭受战火的威胁，地方教育会的活动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这些地方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和影响，“珍珠港事件”之后，失去了外界庇护，多数地方分会结束了他们的活跃期，除了福建与华西之外，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④

抗战初期教育会在上海租界的彷徨中度过了两年，1939年秋德国入侵波兰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上海租界的气氛空前紧张起来，教育会开始担心在租界还能呆多久。此时，整个国家的重心正在迁往西部，成都已经成为上海之外的另一个基督教教育中心，这里无疑将是教育会可供选择的方向。在这之前，教育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干事葛德基已多次前往华西地区调研。1938年3月，为制定全国性的战时基督教高等教育政策，葛德基首次前往国统区调研，此次调研涉及到广州、长沙、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基本覆盖了尚未沦陷的南部中国，葛德基在调研报告中提出要在西南、东南地区另建两个大学中心的建议。^⑤ 一年后，葛德基再次访问华西，并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夫妇及国民政府的六七位部长。^⑥

或许是这两次调研的切身体会，或许是在重庆受到官方的礼遇，此后的葛德基逐渐将目光投向了西部。1940年12月，葛德基携夫人经香港前往华西，并将他的办公地点常设在成都，他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访问四川的基督教学校，考虑到战时葛德基在教育会中的地位，此次葛德基前往华西，实际上已经表明教育会的组织重心迁往了华西，尽管上海的办公场所不变，华人助手们还继续在那里办公。^⑦ 一年后，葛德基的调研期满，可此时“珍珠港事件”爆发，回迁上海已无可能，于是战时教育会的组织重心彻底留在了成都。

为了应对可能恶化的战争局势对教育会的影响，1941年5月13日，教育会的执行委员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会议接受了葛德基关于在华西组织紧急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由吴贻芳、陈裕光、张凌高、刘书铭等七人组成，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这个委员会就要发挥作用。^⑧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教育会担心的紧急时刻最终来临，紧急委员会开始在成都启动，它在战时充当了教育会执行委

① 赵传家：《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一年来会务报告》《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三期，1939年9月，第80—81页。

② 邱道根：《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二十八年度工作大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四期，1939年12月，第86页。

③ 《广东基督教教育二十九年度工作大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四期，1940年12月。

④ E. H. Gressy to Dr W infield (Feb 24 1942),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缩微胶卷档案：RG11—005—110

⑤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Feb 12 1938) (Feb 15 1938), RG11—005—102

⑥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March 11 1939), RG11—005—104

⑦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Dec 4 1940), RG11—005—107

⑧ J. M. Tan “Report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6—March 1947”, 上海市档案馆：U124—0—125 第134—135页。

员会的角色,主要服务于国统区的基督教学校,由华西协和大学的张凌高任主席,葛德基任执行干事。^①于是,葛德基便同时担任教育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干事,在战时危难格局之下,紧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多专注自身事务而难以顾及他,教育会多由葛德基一人唱着独角戏。执行委员会规定,日后所有用于教育会方面的援助资金将全部寄达成都^②,这就意味着战时教育会的组织重心、人事重心和财务重心全部迁移至成都,上海就只剩下一个空洞意义上的办公场所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战后。1943年5月高等教育会议召开之后,梅贻宝被选为高等教育委员会干事,主要负责教育重建和联络政府,葛德基则另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副总干事,他在教育会唱独角戏的局面有所缓和,但未见明显好转。^③

战时教育会尽管遭受波折,但始终未中断,究其原因,除了教育会有关人士的努力外,与纽约校董联合会及其背后的西方差会的支持分不开,他们除了负责向教育会派遣必要的办事人员外,还负责向教育会提供资金援助。抗战爆发后,教育会的本土收入来源大幅缩水,据葛德基估计,华北方面的捐助减少80%,华东减少60%,福建减少80%,这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教育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④但好在来自校董联合会和西差会的及时、持续的捐助,缓解了教育会的资金压力。

战时教育会接受西方捐助情况表(单位:美元)^⑤

年度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高等教育委员会	总计
	校董联合会捐助	美部会捐助	校董联合会捐助	56532.83
1937—1938		750	5000	5750
1938—1939		750	5000	5750
1939—1940	2500	500	4000	7000
1940—1941	2800	500	4900	8200
1941—1942	2500		4000	6500
1942—1943	3000		4000	7000
1943—1944	5000		4000	9000
1944—1945	941.96		6390.87	7332.83

二 战时中学救助

战争对于基督教学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干扰、师生的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学校迁移中的师生流亡,还表现在战争所引发的经济困境。这方面基督教大学的状况要明显好于中学,因为他们有纽约校董联合会的持续援助,抗战八年间,校董联合会共计为基督教大学募集

① J. M. Tan “Report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6—March 1947”,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 135 页。

② E. H. Gressy to C. A. Evans (January 7, 1942), RG11—005—110

③ E. H. Gressy to Charles H. Cobett (June 19, 1943), RG11—005—111

④ E. H. Gressy to Charles J. Bwak (October 12, 1937), RG11—005—101

⑤ 本表系根据 RG—005 亚联董缩微胶卷各档案中提供的数据统计而成。

财政援助 11211568 美元。^① 而基督教中学的状况要糟糕很多,他们不仅面临着迁移费用增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压力,还面临着西方差会捐助逐年减少的实际困难。根据教育会的统计:战后 5 年内,无差会津贴的中学已由战前的 33 所增加到 64 所,即便是享有差会津贴的学校,他们所接受的经费数目也在逐渐减少。^② 以 1938—1939 年度 178 所基督教中学的收入情况为例:^③

学费及其他教育经费	1858726.81 元	71%
捐赠	145415.32 元	5%
差会拨款	315291.57 元	13%
杂项收入	286524.33 元	11%
总计	2605958.03 元	100%

由上表可知,差会的拨款所占的比重甚小,为了弥补经济上的困难,各基督教中学只能多收学生或增加学费,但“此项办法均足使教会中学原有之精神减色”。^④ 在此情况之下,如何帮助基督教学校度过难关,而又不失基督教学校的精神,考验着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及社会各界人士。

在这方面,各地方教育会,特别是沦陷区的地方教育会走在了前面,他们大多将社会救济纳入到各自的工作范围之内,或单独组织,或协助其他社会救济机构进行,有的是单纯的学生救济,有的是综合性的社会救济。以华东教育会为例,他们的社会救济工作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筹款救济中学师生,如 1938—1939 年度,华东教育会总干事赵传家就曾联合张文昌、邱丽英等人向留美友人募集救济费 1500 余元,然后拨付给中学教职员 15 人,共计 500 余元;小学教师 6 人,共计 200 余元;补助苏州孤儿院、南京金女大补习学校、明德女校等校开展救济工作,共计 200 余元;补助中学生 3 人,共计 60 元,总数约 1000 元。尽管数量不多,但对于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二是协助各慈善机关推行难民教育工作,如协助华东联中劝募清寒学生补助金、协助红十字会办理上海市难民教育、协助上海难民协会征募难教经费、协助慈联总会办理难教、协助儿童保育会推行教育、协助萌太太举办平民服务社等等。^⑤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由于战时人力不济,疲于奔波,它在战时的救济工作主要是为基督教中学师生筹集救济款项。对于学生的救济工作,教育会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1937 年 11 月 6 日,葛德基在给纽约校董联合会总干事葛思德(B. A. Garside)的信中就提到学生救济工作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并建议从校董联合会即将要募集的 25 万美元紧急援助基金中拨出一部分用于学生救济。^⑥ 此事发生在基督教学校大规模迁移之前,教育会主张的学生救济范围应主要集中于上海地区。此后教育会便在上海刊登广告,告之教育会愿协助各地流亡学生进入上海继续学习的计划,并建议在上海设立学生救助中心。随后他们更提出一份总额为 3 万美元的基督教学校师生救助计划,覆盖上海、华东、安徽及内地的基督教中学。^⑦ 尽管教育会在与校董联合会的交涉中不断的提

① 刘家峰、刘天路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3 页。

② 杨永清:《战后中国学校教育之动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40 年 3 月,第 13 页。

③ Chester S. Miao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39, p. 215

④ 杨永清:《战后中国学校教育之动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40 年 3 月,第 13 页。

⑤ 赵传家:《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一年来会务报告》,《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三期,1939 年 9 月,第 81 页。

⑥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November 6, 1937), RG 11—005—101

⑦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December 11, 1937), RG 11—005—101

出基督教中学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但由于此时校董联合会对能否筹集到份内的大学紧急援助资金都没有把握,中学就更难以顾及了,对教育会的建议与要求予以了拒绝,教育会的首次中学救济计划也由此胎死腹中。^①

此后,校董联合会的筹款进展要明显好于预期,他们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由70多名精英人士组成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全国紧急委员会”,并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等地设立分会,专门负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筹款事务,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至1938年4月已筹集17.5万美元的紧急基金。^②这就使得教育会可以重提旧事,他们再次提出一项1万美元的学生救助计划,校董联合会勉强接受,答应拨款3800美元。^③尽管如此,这笔基金的取得是教育会在学生救济工作上不小的胜利。

进入1939年之后,各基督教学校多完成第一轮迁移,迁移中师生流亡,生活难以保障的情形普遍存在。为此,教育会还特别组成了一个由刘廷芳、白约翰、缪秋笙、Z. S. Zia等4人组成的学生救助工作委员会,计划筹集5000元,用于救助基督徒、教牧子女、孤儿、在校生、临近毕业生、新生等特殊的学生人群。由于该计划主要服务于各基督教大学推荐的学生,对多数中学帮助有限。^④因此,1939年7月,教育会总干事缪秋笙提出从校董联合会的紧急基金中拿出1500元,专门用于救助高中生,特别是高中毕业生,为纽约所同意。尽管此次对大中学的救助基金仍然不多,但各校的学生反映良好,除燕京大学外,各校学生踊跃申请。^⑤

1940年底,教育会迁往成都后,继续坚持并扩大中学救济工作,不仅救助学生,也救助教师。1941年1月14日,教育会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为基督教大中学生设立一项总额为1万美元的奖学金,用于促进国统区的学生救济工作。^⑥1940—1941年度,校董联合会另设5000美元的中学救助专项资金。^⑦“珍珠港事件”后,学生救济工作更是刻不容缓,1942年成都的教育会紧急委员会启动,他们向校董联合会提出了5000美元的特别救助基金,并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这笔基金的发放工作,这个专门的委员会就是后来“联合援华会中学救济委员会”的前身,教育会的葛德基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执行干事,它在战时几乎为所有的基督教中学提供过援助。^⑧

在国统区,战时中小学教师流失情况也引起了教育会的充分注意。以四川地区的加拿大女子传道会为例,1940年该会所属104名中小学教师有62名流失。^⑨为此,1941年3月,教育会总干事缪秋笙分别致信校董联合会和北美海外传教大会远东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够在1941年提供2万美元,为2000名中学教师提供救助,这项工作将由教育会附属的中等教育委员会和5个地方教育会负责进行。^⑩然而此时国内飞涨的物价指数使得教育会不得不再提出追加它的救助金额^⑪,

① B. A. Garsile to E. H. Gressy (January 24, 1938), RG11-005-102.

② E. H. Gressy to S. M. Gunn (April 8, 1938), RG11-005-102.

③ B. A. Garsile to E. H. Gressy (June 29, 1938), RG11-005-102.

④ Chester S. Miao to C. A. Evans (July 15, 1939), RG11-005-106.

⑤ Chester S. Miao to C. A. Evans (July 15, 1939); C. A. Evans to Chester S. Miao (Aug 15, 1939), RG11-005-106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认为燕大的学生境况较好,故燕大放弃申请的机会。

⑥ J. M. Tan “Report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6—March 1947”,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135页。

⑦ C. A. Evans to E. H. Gressy (November 26, 1941), RG11-005-109.

⑧ J. M. Tan “Report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6—March 1947”,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135页。

⑨ Memo RG11-005-108.

⑩ Chester S. Miao to B. A. Garsile (March 4, 1941), Chester S. Miao to L. J. Shafer (March 4, 1941), RG11-005-108.

⑪ Chester S. Miao to B. A. Garsile (October 26, 1941), RG11-005-109.

1941年6月,葛德基提出中学教师救助的资金应增加至3万美元^①;1941年7月,缪秋笙在美时又向校董联合会提出追加至4万美元。^②或许是因为难以忍受教育会不断追加的预算,校董联合会最终否决了这一计划。^③

“珍珠港事件”后,事情有了转机,校董联合会同意向教育会拨款5000美元用于中学教师救助,此事给了教育会莫大的信心和鼓舞。12月29日,教育会执行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中学救助问题,他们决定这笔救助金将用于提高基督教中学全职教师的薪水待遇,为保证发放的公平公正,照顾到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和个体差异,教育会向国统区的各基督教中学发出问卷,征询各校财务状况和教师生活状况,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类,分配,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2年7月。^④考虑到国统区共有100余所基督教中学,各校经费从3000元到2万元不等,这笔救助资金显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太大问题。教育会重申了需要4万美元教师救助基金之事。^⑤然而这4万美元追加款却最终落空,1942年7月17日,校董联合会来信指出至今为止没有收到任何捐助是用于基督教中学教师救助的,也没有任何计划是关于基督教中学的。^⑥

校董联合会的态度转变,既有其一贯以来以大学为中心的政策考量,也与此时中国形势的变化有关。此时的重庆已经成立了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对华援助机构——“美国顾问委员会”(American Advisory Committee),他们认为除了国统区外,还有大量沦陷区的学生需要救助,而沦陷区周边已经有了他们的救助计划,教育会看起来不太需要了。于是校董联合会将原本拨给教育会的37500美元转给了重庆,由美国顾问委员会另组中学救济委员会来负责处理包括基督教中学在内的所有中学救助事务。^⑦不久,中学救济委员会成立,由包括葛德基在内的5人组成,他们计划筹集资金74万美元来处理中学救助问题,其中10万美元用于救助政府公私立中学,54万美元用于救助美国基督教中学,还有10万美元用于英国中学。^⑧此后,在中学教师救助问题上,就由重庆的中学救济委员会统一进行,教育会逐渐淡出。从1941—1943年,在教育会的配合下中学救济委员会共计向国统区的105所中学2200名教师拨款77500美元,平均每人每年发放350元;而1943—1944年,中学救济委员会拨款20万美元,平均每位教师发放1000元。^⑨在这种情况下,校董联合会认为中学救助事务应交给差会办理,教育会甚至是校董联合会自身都没有必要参与了。^⑩

战时教育会的中学救助工作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与美方的筹款交涉体现了教育会的执著与坚持,就整个结局来看,教育会实际筹集到的救助款项并不多,对于广大基督教中学来说是杯水车薪,但他们的临危不乱、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基督教界同仁所感动,他们更是以实际行动指明了基督教学校应该努力的方向。对此,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战后总结时说道:“该委员会在这时期最大的贡献还是基督教中等学校的救济,没有这种的救济恐怕许多学校不得不关闭,许多好的教员不得不离开我们。”^⑪

①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June 30 1941), RG11-005-109.

② C. A. Evans to E. H. Gressy (July 28 1941), RG11-005-109.

③ C. A. Evans to E. H. Gressy (September 4 1941), RG11-005-109.

④ E. H. Gressy to C. A. Evans (Oct 15 1942), RG11-005-110.

⑤ E. H. Gressy to Winfield (Feb 24 1942), RG11-005-110.

⑥ C. A. Evans to E. H. Gressy (July 17 1942), RG11-005-110.

⑦ E. H. Gressy to C. A. Evans (Oct 15 1942), RG11-005-110.

⑧ E. H. Gressy to C. A. Evans (April 1 1943), RG11-005-111.

⑨ E. H. Gressy to C. A. Evans (Dec 24 1942), RG11-005-110.

⑩ C. A. Evans to E. H. Gressy (Feb 5, 1943), RG11-005-111.

⑪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二届年会报告书》1946年12月,第15页。

三 战时大学规划

对于基督教大学的整体规划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1928年教育会附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曾出台一份“通盘协作计划”,后经多次修改,由于该计划涉及到各校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联合筹款,各方关注较多,分歧较大,最终未果。^①然而抗战的爆发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实现通盘计划的目标创造了条件,教育会对大学规划再次充满期待。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校部分专业相继迁往上海公共租界,在这里他们与上海的高校开始了短暂的联合,教育会将自己在上海的办公场所捐献出来用作各大学的联合办公室。^②1937年11月,教育会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基督教大学会议,参加者主要有教育会干事葛德基、缪秋笙、赵传家,以及圣约翰、沪江、东吴、金陵、金陵女大、齐鲁、燕京、上海女子医学院等学校代表,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战时状态下的大学规划,涉及到各校的合并与调整,会议认为上海地区的大学要联合与互助,在国统区还要另建基督教大学中心。^③为落实大学会议的精神,次年1月教育会召开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要在上海、西南、东南三地建立大学中心,同时为制定全国性的战时大学政策,会议委派葛德基前往国统区调研。^④

在上海,为促进基督教大学中心的建设,教育会多次向校董联合会提出捐助资金,用于上海地区7所大学的联合实验室、图书馆、租金、运输费、家具等建设。^⑤此后,教育会更是提出筹集15000美元用于建设上海联合大学(又称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⑥在教育会的积极运作之下,1938年夏上海联合大学正式组建,当年秋季他们招生2500人(后增加到2702人),约占全国总数的40%—50%,远远超过上年度上海7所大学招收的1768人,这对于上海中心的建设而言是可喜的进展。在联合大学,各校行政、教务、财务密切协作,每周三举行执委会及校长联席会,学生可以使用联合的图书馆、实验室、诊所,也可以互选课程(当年就有200人),部分院系如教育学、心理学、商学开始联合办公,至于其他的各校师生联谊会、联合运动会就更多,联合大学也多次举行联合毕业典礼。^⑦这着实让教育会看到了希望,为通盘协作计划奔波了10余年的葛德基也发出“花费很多时间,利用当前的危机和机会来促成合作是值得的”的感慨。^⑧花费的其实不止时间,还有金钱。从1937至1941年,校董联合会一共拨款86500美元用于上海联合大学的建设,支持的力度很大。^⑨在成都,从1939年开始,4所基督教大学开始采用联合的课程表,在课室的使用和学生的跨校选课上都取得了进展。^⑩通盘计划在上海和华西地区的一时成功,让基督教教育界人士充满期待,有人说道:“这次国难实际上促成了教会的合作,尤其是上海及华西二处大学的协合,今后并拟在沿海

① 刘家峰:《未竟之梦:华东联合大学始末》,《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3年,第147—168页。

②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December 30, 1937), RG11-005-101

③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November 26, 1937), RG11-005-101

④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February 15, 1938), RG11-005-102

⑤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January 22, 1938), RG11-005-102

⑥ E. H. Gressy to S. M. Gunn (April 8, 1938), RG11-005-102

⑦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September 29, 1938), RG11-005-103

⑧ 转引自:刘家峰:《未竟之梦:华东联合大学始末》第158页。

⑨ R. J. M. Mullen to E. H. Gressy (May 12, 1939);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June 26, 1939), RG11-005-106 B. A. Garside to E. H. Gressy (January 22, 1941), RG11-005-108

⑩ Chester S. Miao, "Some facts about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X, No. 10, 1939.

及内地,分区成立集团组织,求更进一步的合作,以尽基督教教育,对于建设新中国的贡献。”^①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由于各校的办学传统不一,对于通盘协作计划向来有不同意见,此次合作不过是战争使然,一旦战争形势和缓,他们还是希望回到各自的校园,如圣约翰大学的一部分师生在1939年就已经从公共租界回迁至梵王渡。^②即便是在各校联合的蜜月期,矛盾也是不断的出现。首先是联合造成的办学拥挤问题,1938年春季,上海公共租界内化学实验室每周竟然要接纳800—1200名学生前来做实验,各校师生苦不堪言,实验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其次是对办学经费的分配问题产生分歧,1937—1938年度,校董联合会一共拨款30万美元,上海联合大学招生数量占全国的40%—50%,却只分配到21000美元,仅占总数的7%,这让加入联合大学的各校着实恼火,争执不断,以至协调人葛德基都放出话来“各校自己想办法”。^③再就是联合中激烈的竞争关系,上海的4所大学一起办公,每周都会召开联合的校长与财务会议,但各院系之间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都希望把自己做大做强,而不是牺牲,一旦他们有实力进行独立运作,就会撤出协作。上海如此,成都也一样,学生互选课程本来可以节约资源、取长补短,但成都5校却竞相兴办一些自己没有或薄弱的专业,其目的显然不在当下协作,而在明朝回迁。^④

这实际上预示着,在表面的合作现象背后有许多深层次的分歧是难以通过外在协调的方式弥合的,战争和物质刺激都是落实协作计划的外在因素,真正的联合应该靠学校自己。或许1941年1月22日,校董联合会给葛德基的一封信能够说明问题:^⑤

上海地区四所基督教大学的未来联合政策是什么?……过去10到15年的经验已经清楚的表明,美国的组织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帮助大学找到答案,往往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我们很容易从纸上找到看起来不错的方案,但这种尝试不仅无用,而且有害,除非由各大学自己提出要求。更糟糕的是我们提出一些妥协的方案,以增加资金和物质上的捐助作为换取他们支持协作计划的奖赏。我想真正的联合不应采用贿赂的方式。大学自己应该要有联合的欲望,而不是物质上的利益刺激。只有大学自己愿意真诚持久的合作,扩大资助才有可能。

尽管如此,教育会对于大学规划的努力并未中断。1939年4月,教育会在香港组织召开基督教大学校长会议,对基督教大学的战时办学方针和战后重建问题进行了规划,考虑到战争态势不明,会议认为目前的规划主要是短期的。^⑥“珍珠港事件”后,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解散,教育会的工作中心也由上海转移至成都,主要从事成都、邵武、坪石、大理4个新的基督教大学中心规划工作。^⑦

1943年春,欧洲战场的形势开始好转,作长期规划的时候到了,英美援华机构开始讨论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战后重建问题。1943年2月,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在纽约成立了一个“战后规划委员会”,他们希望与伦敦的类似组织合作,全面规划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未来,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中国。^⑧与之同时,在伦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委员会也组成了类似的组织。1943年10月,英美双方在纽约还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中国战后规划问题。^⑨英美两国的大张旗鼓引

① 杨永清:《战后中国学校教育之动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40年3月,第12页。

② 《全国基督教大中学迁移近况》,《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40年3月,第90页。

③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September 29, 1938), RG11-005-103.

④ E. H. Gressy to Charles H. Corbett (December 3, 1943), RG11-005-112.

⑤ To E. H. Gressy (January 22, 1941), RG11-005-108.

⑥ E. H. Gressy to B. A. Garside (April 26, 1939), RG11-005-105.

⑦ E. H. Gressy to C. A. Evans (February 19, 1942), RG11-005-110.

⑧ Charles H. Corbett to E. H. Gressy (February 23, 1943), RG11-005-111.

⑨ Charles H. Corbett to E. H. Gressy (September 13, 1943), RG11-005-112.

起了教育会的注意,当年5月他们在重庆、成都召开高等教育委员会战时首次会议,会上对战后规划问题作了集中的讨论,如如何回迁、如何合并、重建资金等,尽管会议没有对保留哪些学校、保留学校的类型、选址等问题形成结论,但他们形成了一个共识:“集中保留几个有影响力的大学。”^①会上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战后规划委员会”,由葛德基、芳威廉、朱经农、梅贻琦、桂质庭、陈文渊等人组成,朱经农任主席。于是,此时竟有3个“战后规划委员会”同时存在。考虑到校董联合会指出战后规划的决定权在中国,教育会要求自己的战后规划委员会要对基督教大学的现状进行重新调查和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规划方针与建议。^②

此后,这3个战后规划委员会分头开展工作,先后提交了不少报告草案。教育会的战后委员会从1943年底展开调查工作,至1945年夏完成报告,送交各大学评论。随后召开的战后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作出“基本接受”的决议,并将此报告及会议纪要送交各大学、差会和纽约、伦敦委员会审议。纽约的委员会对这份报告十分赞赏,他们建议校董联合会接受这个报告,于是在1946年5月校董联合会年会上,最终批准了以教育会的规划报告为蓝本的战后重建计划。^③

对于中学规划,教育会战时所作不多。1945年初,教育会组织了由长老会传教士卫礼士(Raph C. Wells)、真光中学校长何荫棠、华中大学教育科教授黄溥、万县卫理中学的里查德森(Thomas A. Richardson)等人组成的中等教育调查团,他们走访了四川地区的21所中学,就教学方法、学校管理、财务问题、宗教教育、女子教育、公民教育、战后重建等问题进行了调研。^④其中,卫礼士提出在战后重建当中,各中学要与教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各教会都要组织自己的教育干部负责本教会的复员工作。“凡有全国组织的教会,应由最高的教会团体组织该教会的基督教中学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指导之下设干事部,执行该委员会的议决案,从事于该公会中等学校的计划与管理。凡未有全国组织的教会,可用地方组织由各地方的董事部,在董事部之下设一干事部,负责计划与管理该地方的基督教中等学校”。^⑤这一思想在战后基督教中学重建当中被采用。^⑥

四 战时宗教建设

呈现“宗教性”是基督教学校有别于普通学校的重要标志,然自1927年以来各基督教学校在政府法令的压力之下纷纷立案注册,成为国家教育系统之内的私立学校,而政府对于私立学校的宗教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及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宗教团体设立之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及其同等学校,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⑦于是,在世俗化的巨大冲击面前,学校基督化特色的维持是项令人苦恼的问题。据江文汉分析,战前基督教大学平均只有30%—40%的学生是基督徒,教员中传教士所占人数不足1/3中国

① E. H. Gressy to Charles H. Cobett (June 19, 1943), RG11-005-111.

② E. H. Gressy to C. A. Evans (November 13, 1943), RG11-005-112.

③ 刘家峰、刘天路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236页。关于此报告的内容,也可参见该书第236—243页。

④ J. M. Tan “Report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6—March 1947”, 上海市档案馆:U124-0-125第135—136页。

⑤ 卫礼士:《战后基督教中等学校的改造》,《会讯》第一卷第一期,1947年1月15日,第3页。

⑥ J. M. Tan “Report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6—March 1947”, 上海市档案馆:U124-0-125第136页。

⑦ 《私立学校规程行将修正》,《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39年6月,第75页。

教员中的基督徒不足 25%。^① 中学状况也不容乐观，战前基督教中学基督徒比例约为 35%，选修宗教课程的只有 33%。^②

1931年7月，为促进家庭、学校、教会中的宗教教育工作，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组成了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教育会宗教教育委员会总干事缪秋笙兼任促进会总干事。^③ 他们的主要工作有：“1. 唤醒基督徒男女工作人员在宗教教育事务上的新觉悟与理想。2 联合教会、教会学校及基督徒家庭等方面的宗教教育委员会，分工合作，向同一目标迈进。3 鼓励并协助各教会机关合办短期训练学校，暑期学校，及其他有效力的训练机关，使义务人员以及领薪人员，都能享受相当训练。4 创作、宣传、出版、完善宗教教育课程、书籍与教材，并协助各文字机关刊印并推销宗教教育应用的文字与教材。”^④在促进会的努力之下，1930年代他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调查大中学师生宗教生活、组织学校基督徒团契、开办宗教培训学校、搜集编写宗教素材与书籍等，对丰富学校的宗教教育活动起了推动作用。

作为教育会下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战前也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基督教大学的宗教生活问题。1936年1月，在高等教育委员会年会上，他们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基督教大学宗教生活委员会，由来自各大学的10名成员组成，他们期待与宗教教育促进会和基督教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世俗化所导致的一些问题。^⑤一年后，专门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世俗化是普世问题，各校都应组织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应对世俗化对大学生活的影响，校董联合会还应派出专员进行指导；同时他们还提出校董联合会和金陵神学院紧密协作，为大学教员和学生提供一笔奖助金用于改善大学宗教生活。^⑥

抗战爆发后，在战火中师生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经常不在一起，宗教活动自然难以稳定的开展起来，加上各校为缓解办学经费的压力，大量招收非基督徒学生，造成了校园基督化氛围空前的紧张，世俗化充斥着整个校园，这在学生的选择专业上也可以看得出，1936—1937年学生选择最多的是化学专业，其次是农学、经济学、生物学和医学；而到了1939—1940年学生最多是经济学，其次是化学、工程学、教育学和医学，包括哲学、宗教在内的人文科学持续垫底。^⑦这一方面反映出战时的青年学生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的宗教热情正在衰退。所以，如何应对战争加剧的世俗化危机，恢复宁静的基督教校园是基督教教育界面临的残酷现实。

除了世俗化之外，抗战时期基督教教育还面临着爱国主义形象的重塑问题。战前，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国人对于基督教学校的“洋化”色彩曾展开激烈的批评，基督教教育一度被与“爱国”、“卖国”问题挂上了钩。抗战爆发后，内迁是国民政府的决策，尽管对于基督教学校，国民政府没有严格的要求，大多数学校仍然决定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但还是有一些学校没有按政府的要求去办，他们要么就近迁入外国租界寻求庇护，要么呆在原址不动，使得人们再次怀疑基督教学校的爱国形象，有的甚至质疑基督教学校与侵略者是否存在妥协。在这特殊关头，如何通过宗教教育，造就良好的基督化人格，贯彻基督教救国的理念，也是基督教教育界需要给国人交代的问题。1939年香港基督教大学校长会议召开时，《申报》曾发表评论：“我们认为基督教的人格，最主要的

① Kiang Wen-han “Seculariz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V III No 5 1937, p 302

② Chester S. Miao “New Trend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X II No 2, 1941, p. 64

③ Alice Gregg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Chinese Christian Year Book 1934—1935, p 247.

④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略述》，1933年，上海市档案馆：U 123—0—3Q

⑤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VIII No 2 April 1936, p. 123

⑥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IX, No 2 March 1937 pp. 160—161

⑦ Chester S. Miao “New Trend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X II No 2, 1941, p. 63

就是为保卫真理正义为拯救人类道德而不惜牺牲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正与我中华民族今日为解放中国与拯救世界和平而坚决抗日的斗争精神,并无二致,因此我们谨敢期许今后基督教教育界能够协力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的提高,协力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推行。”^①

由此,抗战时期的世俗化趋势和爱国主义形象塑造都需要基督教教育界投入更多的精力,作为教育界的代表,教育会自然责无旁贷,无论是总会还是分会在抗战时期都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四川基督教教育会一经成立,便将协助各校开展宗教活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之一,他们负责开展的活动有:调查各校宗教活动情形;促进教会与学校的联络;联络青年会学联会及其他服务学生的团体;举行基督徒教职员退修会;组织与辅导各校基督徒学生团契;介绍宗教书籍和刊物等。^②类似的还有福建教育会,他们也举行了一些协助学校的宗教活动,如调查各校宗教活动情形、促进教会与学校联络、协助各校学生青年会工作、辅导各校基督徒学生团契、办理流动文库介绍宗教书籍、组织宗教教育工作团到校开展工作等。^③

与地方分会实际参与学校的具体宗教活动有所不同,总会则主要侧重于宏观上的调查、研究、协调与决策,具体而言就是任命专门的委员会去从事宗教调查、促进校友参与教会事务、宗教课程建设、中国宗教研究、以及探讨基督化人格教育等等。

1939年春,教育会组织了中学宗教工作委员会,由马鸿纲负责,他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编写宗教教科书和组织基督徒教师团契。^④从1939年4月1日至7月7日,马鸿纲用3个多月的时间调查了包括重庆、成都在内的四川8个地区16所中学的宗教生活状况,其中包括4所从沦陷区迁去的学校。同年10月,马鸿纲提交了他的调查报告《中学宗教工作》,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包括培养学生兴趣、组织师生团契、丰富宗教读本、增加资金投入、设置奖助金、加强校际沟通等14项加强宗教工作的建议。^⑤为促进校友参与教会工作的热情,1938年教育会设立了教会与校友关系促进委员会,一年以后教育会聘得吴高梓为执行干事,这项工作正式开展起来。他们邀请基督教大中学的校友参与到教会工作当中,并通过校友去帮助教会寻找学校人才培养与教会发展需要的关联。为便于在各地开展校友工作,教育会还在上海、重庆等地设立促进分会,各分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自己的组织和干事,如上海分会在1940年9月拥有了自己全职的专任干事。^⑥此外,为促进学校宗教课程的建设,教育会在1940年设立了一个宗教课程委员会,共有8人组成,除了教育会干事缪秋笙、赵传家、马鸿纲之外,还有顾惠人(华东联合中学校长)、沈体兰(上海麦伦中学校长)、陈熙仁(华东联合中学宗教主任)、葛继恩(上海中西女子中学宗教主任)、张仕章(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编辑)等人,由顾惠人任主席。宗教课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有:至各校从事宗教课程的调查;现有宗教课本的选择与介绍;编译现在所缺乏的宗教课本;征求各校在教材方面的合作。^⑦

各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对于基督教的兴趣在提升。1939—1940年基督徒中学生的比例已经回升到42%,选修宗教课程的学生占到了43%。齐鲁大学的斯坦东教授(Prof. Stanton)乐观的认为:“到处都向教会敞开了大门,学生都做好了接受福音的准备,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在长达6000公里的旅途中,在20所大学中,我们看到的是普遍的欢迎。学生坦然的表达怀疑,

① 《全国基督教大学会议的收获》,《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39年6月,第41页。

② 《四川基督教教育协会二十八年度工作大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39年6月。

③ 邱道根:《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二十八年度工作大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四期,1939年12月,第86页。

④ Chester S. Miao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39, p. 219

⑤ H. K. Ma "Religious Work in the Middle School",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X, No. 10, 1939, pp. 563-565.

⑥ Chester S. Miao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39, pp. 220-221.

⑦ 马鸿纲:《基督教中学宗教课本的调查与介绍》,《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40年3月,第43页。

自由的提问,但绝没有反对和不友好的批评之声。”^①我无从考证在迁徙中以上数据的准确性,也无从考证斯坦东言论的普遍性,更无从考证以上成就的取得与教育会的直接关联,但教育会为学校宗教工作所作出的杰出努力与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抗战期间,教育会在宗教上所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组织中国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Religion in China),促进有关中国宗教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这项工作的筹备从战前的1936年就已经开始了,在1936年1月的教育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年会上,他们通过决议:为促进中国人信仰问题的研究,深化现有中国宗教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决定成立中国宗教研究所,筹备工作将由执行委员会进行。会议决定:“在筹备期间,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提名不超过20名组成人员(其中要包含大学以外的人员),他们应该居住在中国,能够参与到研究所的实际工作当中”;“无论中外人士,只要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都可成为其会员,只不过国外会员享受不到正式成员的一些特权”;“这个研究所应该是独立的组织,但可以选择依附于高等教育委员会或是协进会。”此外,他们还要出版刊物。教育会给出了3年筹备期,期满将召开成立大会,由研究所自己规划未来。^②1937年2月,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名了20名组成人员,其中10名来自基督教大学,10名来自其他研究机构,葛德基担任执行干事,负责具体筹备工作。由于这个研究所不仅包括基督宗教,还包括中国本土宗教、佛教、聂斯托里教等多种宗教,所以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首先要与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进行联络。此后,执行委员会分别联系了国内、日本、印度、美国、英国等地的宗教研究者。^③

抗战的爆发暂时中断了这项计划,1940年之后,各方开始重提研究所建设之事。^④1941年11月,葛德基给纽约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对设立缘由、筹备状况、存在问题作了介绍。葛德基提出:“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的宗教学学习方式,宗教系不被教育部承认,宗教学学位也不被认可,所以这个研究所的设立对于促进中国的宗教工作尤为重要。它不仅对促进中国人的宗教学学习,而且对促进中国人的哲学修养都意义重大。它将为中国、日本、印度、西方的宗教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他还强调“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⑤

为什么战争尚未结束,甚至连好转的迹象都没有竟又重提研究所建设之事?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建设中国宗教研究所是为了增强中国宗教学科和中国人宗教情感的一贯主张,此时各校迁移之后基本稳定,可以重提旧事;其二,此时的华西地区已经有人在类似工作,从联合的方面考虑,这项计划将为华西4校的联合提供平台,也与建设成都大学中心的愿望相符;其三,金陵神学院董事会此时提出了一项高达1万美元的文化奋兴计划,其中就包含宗教问题,机会难得。^⑥因此,葛德基果断地向纽约校董联合会提出了高达35000美元的研究所建设计划,这笔钱将用于宗教图书馆建设、购买日文宗教书籍、为研究者提供经费资助和成都研究中心的日常开支等,计划建设周期3到5年。^⑦

此后中国宗教研究所的建设工作全面展开,1941年后校董联合会每年拨款1000美元,金陵神学院1941、1943—1944年各拨款2000美元用于研究所的建设。有了资金的捐助,各项研究工作也相继展开,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宗教生活调查、宗教史和宗教文学。

① Chester S. Miao “New Trend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XII No 2, 1941, p. 64

②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XVIII No 2 April 1936, pp 125—126.

③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Religion in China”, RG11—005—109

④ C. A. Evans to E. H. Gressy (December 13, 1940), RG11—005—107.

⑤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Religion in China”, RG11—005—109

⑥ E. H. Gressy to J.W. Decker (November 11, 1941), RG11—005—109.

⑦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Religion in China”, RG11—005—109

1941年,研究所开始着手中国二十朝宗教史的资料搜集工作,在一年内,他们搜集到的早期宗教史料2万余份,后交由金陵神学院整理出版。1943年7月26—28日,首届中国宗教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华西协成大学图书馆召开,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在内的25位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15篇,对中国各类宗教问题展开研讨。^①按照1936年筹备会议的设计,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实际上预示着中国宗教研究所已经成立,此后它将脱离教育会的组织系统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由于葛德基仍然担任研究所的执行干事,此后的很多事务实际上都需要依托教育会来进行。

五 战后重建

1945年8月,战争比人们预期的更早结束了,如同其他的基督教机构一样,教育会也立即着手回迁上海。在执行干事葛德基的积极努力之下,1946年初回迁工作基本完成。由于战时教育会议保留了执行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成都继续活动,其他部门包括上海总部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如何让教育会的各项活动都能重新组织起来是回迁后的首要问题。1946年5月教育会在上海召开战后首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教育会整体重建规划问题。1946年8月,利用各基督教大学代表在上海参加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的机会,教育会召开战后重建会议,组建了一个以东吴大学校长盛振为为主席的教育会临时委员会(*Provisional Committee*),这个临时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过渡时期教育会的角色,此后教育会便进入了一个“自我复原期”(Self-rehabilitation)。不久,因健康原因,葛德基夫妇回国,福建协和大学的檀仁梅被选为执行干事,具体负责重建工作。^②

战后的教育会继续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教育委员会的名义存在^③,1947年1月,教育会发行《会讯》中文季刊;3月,又发行了英文《会讯》季刊(*CCEA Newsletter*),大有恢复战前中英文《教育季刊》的势头。1947年9月,教育会经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核准立案,成为国民政府管辖下的正式合法团体。^④1947年10月29—31日,教育会召开战后第一届全国大会,其主题是“战后基督教教育之目标与标准”,很显然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教育会走向的会议。会议总结了教育会自回迁以来的工作状况,并制定了未来教育会的工作计划,会议指出:今后的教育会要加强与基督教大中学的联系;提倡各校的交流工作;强化与区会组织的关系;密切与差会的联系。^⑤会议还通过了教育会新章程^⑥,选举檀仁梅为教育会执行干事,白约翰为副执行干事,马鸿纲为宗教教育干事,张南伯为代理宗教教育干事,毕镐英为总务干事及《会讯》编辑,董远观为影音教育合作干事。^⑦

这样,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教育会从制度和人事上都恢复了组织活动,此前,华东、广东两地也相继恢复了地方教育会组织^⑧,这就表明整个教育会系统已初步完成重建工作,此后的教育会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为基督教教育服务。1948年6月教育会的团体会员是99个,个人会员是595

① E. H. Gressy to C. A. Evans(October 13 1943), RG11-005-112.

② J. M. Tan "Report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46-March 1947", 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25 第134页。

③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十二届年会报告书》1946年12月3—11日,第37页。

④ 《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战后第一届全国大会手册》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3, 第14页。

⑤ 吴贻芳:《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与今后基督教教育》《会讯》第一卷第十期,1947年12月15日。

⑥ 《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章程》,上海市档案馆: U124-0-20。

⑦ 《本会干事部同仁提名》,《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战后第一届全国大会手册》上海市档案馆: U124-0-13。

⑧ 参阅《会讯》第一卷第三期《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通告》(1947年1月15日),第一卷第十期《复员一年来之广东基督教教育协会》(1947年12月15日)。

人^①;到了 1950年 3月,团体会员达到了 133个,个人会员是 1072人。^② 1943—1944年度在教育会注册的教会中学是 117所,到了 1948—1949年度,增加到了 235所,恢复到了战前水平。^③

然恢复之后的教育会与战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吴贻芳曾指出:“本会组织的强化,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奠立,本会既无会所,又乏基金,现状的维持已非易事,遑言扩张与强化。”^④可见,无论是组织上还是经济上,教育会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就组织来看,战后的教育会没有恢复其核心部门——董事会,这就意味着教育会此后工作的重点将是研究与建议,对于各校是否能够贯彻执行,教育会已难以顾及了。即便有好的研究建议计划,教育会已经没有成系统的地方教育会和 4组专门委员会去执行,因而无从下手。从财务上看,复员之后的教育会也是危机重重。1947年全国大会拟定教育会预算共需经费 3 145亿元国币,但教育会至多可募集 2 195亿元,收入相抵还有 9500万没有着落。^⑤ 此时的教育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 1.8亿拨款,约占 80%,差会方面的捐助不多。教育会所规划的经济战略是“一面应有自立自给的远象,一面应欢迎差会的友谊赞助”。^⑥ 在差会捐助无多的情况下,教育会必然会将目标转向自立自给,于是 1947年之后,教育会发起征求会员运动,其目的“一在引起各基督教学校及学校的教职员对于本会工作的兴趣;二是要借此机会,使本会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因为教育会认为“本会如不自力更生,便没有什么将来可言,一个中国机关赖国外资助,根本也不是办法,更不是健全的机构,本会既是个人——基督教学校教职员和团体——基督教学校会员所组成,最高权力也是属于他们,这些会员便应当负起经济的和其他种种的责任”。^⑦ 当时制定的会员费是 5万国币^⑧,但 1948年之后,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货币贬值,使得原本就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国民党统治末期的教育会步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研究会”,其宗旨是“团结全国基督教各教会所设之学校,共同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之理论与实施”。^⑨ 此时的教育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宗教研究机构。1950年 12月 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和决定》,此后基督教学校在中国大陆都没有了,教育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本会今年后方针,亦采取与各基督教学校同一步骤,本会过去工作,已尽了历史的任务,应告一段落”。^⑩ 这样,1951年 2月,教育会停止了一切活动,彻底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作者张龙平,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CCEA *New letter*, Vol 2, No 2, June, 1948, p 5

② 毕锡英:《坚定信心 努力工作——本会事工研究会记略》《会讯》第四卷第三期,1950年 3月 15日。

③ CCEA *New letter*, Vol 3, No 1, March, 1949, p 7.

④ 吴贻芳:《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与今后基督教教育》《会讯》第一卷第十期,1947年 12月 15日。

⑤ 《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战后第一届全国大会手册》上海市档案馆:U124-0-13,第 11页。

⑥ 吴贻芳:《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与今后基督教教育》《会讯》第一卷第十期,1947年 12月 15日。

⑦ 毕锡英:《坚定信心 努力工作——本会事工研究会记略》《会讯》第四卷第三期,1950年 3月 15日。

⑧ CCEA *Newsletter* Vol 2, No 3, September 1948.

⑨ 《会务动态》,《会讯》第四卷第五期,1950年 5月 15日。

⑩ 《会务动态》,《会讯》第四卷第五期,1951年 2月 15日。